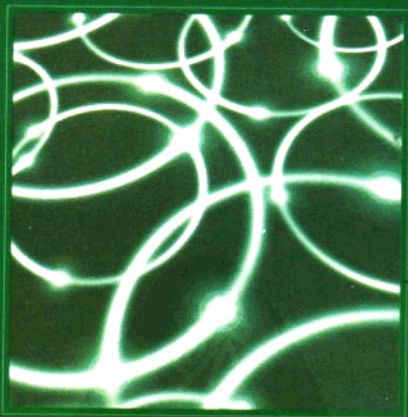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

◇ 杨华山/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多,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迸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序

华山的论文集《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就要付梓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作者出于客气，一定要我为之作序。恭敬不如从命，就信马由缰地谈谈读后感吧。

文集的中心大旨，显然是要从中国近现代的史事人物与制度变迁之间，来寻求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但究竟何谓“社会转型”，华山似乎采取的是迂回曲折、缠绕接近的战术，并未直接点破，这就使我这位名份上的“导师”，要急着替学生把未尽之意表达出来，让读者诸君能更准确地体会著者的深文高义。所以，“序”还得从“社会转型”的内涵说起。

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实际上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其基本涵义有二：首先它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通常需要持续较长的时间，其间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的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和改革来完成；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具体到本论文集所涉及到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其实就是从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它包含两个相互交错的结构替代过程：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旧结构的松动、萎缩、解体；一方面则是工业文明新社会结构的潜滋暗长，逐步排挤、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旧的社会系统的解构与新的社会系统的建构构成近代社会转型的二重基本运动。近代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和冲突均是围绕这二重基本结构运动而形成、展开，衍生出一部多彩多姿、复杂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史。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关键就在于如何解读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历史运动过程的特殊性及其具体展开形式。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华山这部论文集也就是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历史层面描述、刻画和探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展开形式和具体表现。除却一些短篇的书评和杂感外,作者大体是围绕近代人物与经济思想和制度变迁来探索“转型”的历史轨迹。前者有《肃顺新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心态探析》诸篇;后者有《中国近代早期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研究》、《厘金与晚清早期现代化——湖北个案研究》诸篇。

正由于作者有“社会转型”的历史理论思考在先(或在于心),对近代历史运动的过渡性、复杂性、多面性了然于胸,故在进行具体的历史探讨或臧否历史人物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更深处,常有出人意料的新鲜之论。譬如历来对1861年“辛酉政变”的主角肃顺评价不高,多归入“颟顸”一类。但华山在仔细爬梳史料,还原历史真相之后,对肃顺严刑峻法、整肃吏治的改革之举作了正面的肯定,不以成败论英雄,认为“历来对肃顺评价不高,主要是由于‘官方的记载很不利于肃顺’”。其实,“他重用汉族人才的政策不仅是成功的,更为其政敌所袭用。”“如果说洋务运动是清末的重大改革运动的话,那么肃顺的改革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其承上启下的过渡衔接作用盖在于此。而肃顺在《瑷珲条约》交涉中的出色表现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对其历史地位的肯定。”就我自己的判断而言,华山的论断似乎是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此外,对道光皇帝和袁世凯的评价,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在经济制度史研究中,华山也充分注意到了近代历史的转型、过渡特点,对“厘金”、“官利”等晚清特定时代的产物,均有比较中肯的持平之论,而没有轻易否定或肯定。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转移,这乃是历史的铁律,也是历史辩证法的精华。对此,华山可以说是心领神会,运用自裕的。华山的论文集虽立了很大的一个题目,处处亦体现出清醒的理论自觉,但所论又往往趋于“小”和“实”,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得了章派(以章开沅先生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史学的真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章开沅先生及其弟子们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现代化史问题以及中国近代

序

文化诸问题作了许多宏观理论层面的思考,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大气,但这种“大”却又并未流于“空”和“虚”,而是结合诸多具体历史问题,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对历史作实证性的研究,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华山虽非章先生的亲炙弟子,但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和团队精神中,耳濡目染,自然也受益良多。这种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在这本论文集中亦有充分的体现,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体会得到。

华山论文集的另一个特点,则是通篇所体现的一种平实、流畅,天然去雕饰的朴实文风。俗话说“文史不分家”,好的史家一定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好的史学论文一定要有好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对一个历史学者的专门职业要求。时下的一些史学论文文字之晦涩难懂,表述之七拐八弯,已经到了不能容忍、无法读懂的地步,使一般人视史学为畏途,完全提不起阅读的兴趣。为此,我们要大声疾呼来一次史界的文字革命,让我们重新回到司马迁,回到翦伯赞,回到朴实、清新、直抒胸臆的良史文风。“文以载道”,岂可小视哉!我非常欣赏华山在其论文集所作的种种文字表述上的努力,也愿他继续发扬这种朴实的文风,作一个表率。我和华山作为师生已交往多年了,多年来他以沉稳的个性、明敏的才思、扎实的工作,默默耕耘在近代史学的沃土中,在一个山区高校一待就是十余载,教书育人,勤勤恳恳,为振兴家乡的高教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所践行的,可以说是“小地方,大事业”,真正体现了母校“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精神。现在,目睹华山在史学中的丰收,我怎么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呢?惟愿他能沿着这条并不奢华轰动却淡泊而充实的人生道路继续往前走。成功永远属于那些志向远大,心有定力,孜孜以求,决不旁骛的“老实人”。是为序。

马敏

2004年7月于桂子山“淡泊斋”

目 录

-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心态探析 (1)
- 肃顺新论 (13)
- 论张謇的教育经济思想与地方建设 (34)
- 论近代中国早期的官商关系
——以《胡雪岩全传》为透视点 (43)
- 武昌首义后时人对袁世凯的期盼心态探析 (56)
-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原因新探 (81)
- 论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汉冶萍“合办”风波 (91)
- 略论孙中山的开放意识 (102)
-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列宁论孙中山及辛亥革命 (110)
- 与时俱进 奋斗不止
——孙中山的精神及其启示 (119)
- 论民初“中央学会”的筹设与夭折 (124)
- 中国近代早期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研究
——郑观应个案分析 (138)
- 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
——郑观应个案研究 (162)
- 再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
——郑观应个案研究 (174)
- 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 (183)
- 论前现代中国社会资本状况及其走向误区 (196)
- 略论晚清内外债的发生及其作用 (214)

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

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二难困境	
——晚清专利与官利制度述评	(225)
厘金与晚清早期现代化建设	
——湖北个案研究	(235)
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派的“裁厘加税”思想	(244)
论清末“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257)
论晚清资本原始积累路径的失误	(273)
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305)
论移民与民族融合	(319)
论移民开发西部与促进民族融合	(333)
探索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构成的力作	
——读《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345)
南社史研究的新奉献	
——读《南社史长编》	(353)
论《潘岳诗文集》的灵魂与精神及其他	(357)
当代转型时期的领导干部群像	
——长篇小说《组织部长和他的同事们》评析	(369)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特征	(382)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390)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	(400)
今天不是昨天仍似昨天	
——一本书与中日关系断想	(409)
皇帝的新装：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历史误区	(418)
新世纪的梦想与现实	(429)
后记	(436)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心态探析

作为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对事对人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基本就决定了该事件的进退和该人物的浮沉。所以，道光帝个人对鸦片问题及整个鸦片战争的态度，对于鸦片之禁弛和鸦片战争之胜败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道光帝妥协、求和、动摇、投降、卖国。后来又有学者或者一反传统观点而认为道光帝是抵抗派；或者认为道光帝左右摇摆，应当划阶段来论述，在某一阶段主战，在某一阶段妥协；或者认为道光帝是速胜论者。本文则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的态度始终是主和的。

(一)

鸦片战争与鸦片问题紧密相联，因此，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一般认为，道光帝在禁烟问题上早就是动摇派，发展到鸦片战争更是如此，而谈起禁烟，总使人们首先想到林则徐。实际上远在林则徐之前就早已开始禁烟了。据已知资料，清朝最早的禁烟令发布于雍正七年（1729年）。^①此后的乾隆、嘉庆两朝，同样发布过禁烟令，特别是嘉庆朝迭布禁令，并正式裁鸦片之税，又禁止国内种植鸦片。^②道光帝继位后，“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为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③禁烟之令更严于前朝。正如马克思所说，到鸦片

① 见刘锦藻编《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一，征榷考二十三，洋药。

② 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9页。

③ 李圭：《鸦片事略》卷上。关于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前禁烟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道光元年至十九年有关论折。

战争前夕，“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①。

据以上所述可知，自雍正至道光历朝对鸦片皆持禁止之态度，既有谕令也有行动，无非在道光之前烟禁执行不力以及没有因禁烟而引起战争，故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间主要的原因是鸦片输入数量还少，给中国造成的祸患较小。而到了道光时期，不仅大量白银外流，而且吸食毒品的“恶习已发展到所有阶层，连乞丐也免不了。它的危害是如此深远，这种恶习如此迷人，如此暗中为害和如此难戒，受害的人又如此广泛，无怪引起了华人的重视，要求采取强烈措施来制止它的蔓延。”^②道光帝严厉禁烟并非前后动摇而是始终一贯的。正因如此，才有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才有虎门销烟的历史性壮举。

那么，这与他在战争中的主和态度岂非矛盾？其实不然。因为禁烟不同于“启边衅”，不会“糜餉劳师”，而且可以杜塞漏卮，整顿吏治，一举多得，自然决心好下。但后来形势的变化太大，出乎道光帝意料之外地爆发了战争，道光帝自然要竭力消弭战争。而战争又系林则徐“措置失当”所引起的，故按道光帝的推理，惩办林则徐以避免战争实是顺理成章之举。可见，禁烟与主和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不能以今人的思想去替代道光帝的逻辑推理。

(二)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道光帝没有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有衅固叛，无衅亦叛”^③。他以为只要自己不轻启边衅，就不会闹事，便可相安无事。战前他旨谕“林则徐、邓廷楨体察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9页。

^②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0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以下简称《始末》）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73页。

情形,相机筹办,务使闻风慑服,亦不致骤开边衅,方为妥善”^①。此后一时期内“勿启边衅”、避免“糜饷劳师”等语在道光帝的谕旨中反复出现,这是其避战、“节俭”的主张使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勿启边衅”等语逐渐成为道光以后清政府对外避战屈服的遁词。必须指出,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不同,故二者的性质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实际上道光帝早已有这种避战思想。1832年至1833年英国侵略者武装侦察我国沿海时,林则徐向道光帝建议采取强硬措施。道光帝顾虑到会“别生枝节,致启衅端”因而责怪林则徐“妄逞材能”^②。姑且不论道光帝所言正确与否,但不难看出,他是力避“衅端”的。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令林则徐“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又谕邓廷桢协助林则徐“趁此可乘之机力救前此之失,总期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③，“务使根株净尽,镛蔽全除”^④。道光帝赏识林则徐的能干和禁烟的决心,以至于林则徐动身南下之前,八天之内他连续召见林八次,并给林“紫禁城内骑马坐轿”的殊荣。^⑤当他得知林则徐到广州后表示将与禁烟相始终时,他也“深为感动”^⑥。这里充分表现了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信任和支持以及殷切期望林能解决鸦片严重泛滥之痼疾。道光帝此时给林、邓的谕旨中没有谈及作战的问题,他也不以为禁烟会开启边衅。当英军侵占定海陈兵白河时,道光帝认为,既然英夷是来“鸣冤”的,而且“情词恭顺”,那么为了表明天朝皇帝的“大公至正”之

① 《东华录》道光朝卷三九。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10~111页。

③ 《始末》第一册,第132页。

④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38页。

⑤ 见《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16页。

⑥ 《鸦片战争》第六册,第210页。

意,他同意英国照会要求为其“昭雪伸冤”,另派钦差大臣赴粤“逐细查明”,“秉公查办”,“代申冤抑”,“重治其(指林则徐)罪”^①。但“赔偿烟价,割让岛屿”两项涉及主权的原则性问题,因坏“成规”而予以拒绝。道光帝相信有这些“善妥昭雪定事”的措施,英军就不会“相战不息”^②的。他不愿意消耗“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③,故让英军南下到广州和谈,力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此,林则徐失去了道光帝的信任和支持。道光帝指责林“外面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联也?”^④又斥林、邓“办理终无实际,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⑤林则徐被革职后仍犯颜直陈:“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道光帝朱批这是“恫喝于朕”,“无理、可恶!”^⑥

所有这些,一般都认为是道光帝在推卸责任。其实道光帝个人确实以为战争是因林则徐“办理不善”而引起的,所以随着以后战争的发展,他对林则徐等人的处罚也越来越重。与此相反,道光帝希望琦善能够“仰体圣意”,解决林则徐所“惹”出的麻烦。

由于气候多种原因,英军在得到“惩办祸首”的回答后“启碇南旋”,这更增强了道光帝对他本人想法的自信心,以为事情基本完结,有琦善在广东谈判即可解决问题。因此,他很轻松地说:“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

① 《始末》第一册,第392页。

② 《始末》第一册,第386页。

③ 《始末》第一册,第513页。

④ 《始末》第一册,第393页。

⑤ 《始末》第一册,第483页。

⑥ 《始末》第一册,第531页。

之师耶？”^①遂下令调至镇海的防堵兵丁“酌量撤回，以节糜费”。当邓廷桢上奏“闽洋已觉腹背受敌”，要求加强防备时，道光帝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邓廷桢……不知所受何敌？该夷……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戡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②然而，道光帝的幼稚反而助长了英军的侵略野心，英国侵略者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

道光帝本来以天朝皇帝自居，视英国为不知位处何方的“蛮夷小邦”，准其贸易就是格外“施恩”，何况还同意了他们的部分要求，如惩办“祸首”林则徐等，道光帝幻想以此为契机恢复秩序，但英夷却得寸进尺，坚决要求割地赔烟价，“狡焉思逞”，这实在是对天朝尊严的莫大冒犯。而身负和谈重任的琦善却不能“消息”。及至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道光帝终于大为震怒，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下令调军对英作战。而当广东巡抚怡良弹劾琦善“割让”香港时，道光帝斥琦善“辜恩负国，实属丧尽天良”，下令将他“革职锁拿”，“押解来京”，所有家产“查抄入官”^③。这里对琦善的处罚远甚于林则徐、邓廷桢，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道光帝并非所谓的“投降派”。

但这并不能说道光帝转向了主战。道光帝避战，并非完全放弃抵抗。事实上，道光帝的“不开边衅”是要求沿海督抚将帅等统兵大员不“主动”开衅，并不是连必要的防御也不要，这两个问题在道光帝身上是统一不可分的。早在英军自天津南返时，他就飞示沿海督抚将帅“一体遵照，各守要隘，认真防范，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④这里强调的

① 《始末》第一册，第513页。

② 《始末》第一册，第524～525页。

③ 《始末》第二册，第805页。

④ 《始末》第一册，第467页。

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关要求督抚加强守备的命令在此时期谕旨中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即使是在宣战谕旨中,强调防御也是其重要内容:“至沿海各省洋面,叠经降旨,严密防范,著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①

因英军欺人太甚被迫给以必要的反击并不能说明道光帝在整个战争中是主战的。这里不能仅看一时的行动,更要联系前后分析其心理状态。如果说道光帝这时主战的话,何以不起用坚决抵抗的林则徐呢?因为道光帝没有与英军真正作战的坚定心态,只想稍示“惩治”,煞其威风,遏其凶陷,所谓“玩则惩之”,“不失国体”^②,这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需要讨论的是全局性的问题。就全局而言,道光帝是尽量避战的。处罚琦善,又不起用林则徐,正是这一主导思想的反映。林则徐对于道光帝“大伸挞伐”、“断无游移”的话当时就表示果否如此,“仍属难料”^③。虽说林则徐对道光帝的确切意图不十分了解,但他已看出道光帝并不会一意主战。

在这期间,道光帝为奕山所捏造的战报所惑,以为奕山真的打了胜仗,于是再次下令沿海督抚撤兵:“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叠次焚击,业已击退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著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如何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④两江总督裕谦等皆言英军即赴浙江请缓撤兵,道光帝认为这是没有来历的“风闻”,仍令其裁兵,以避免“糜饷劳师”。如果道光帝真正主战的话,则他绝不会在没有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而仅仅是将英军“击退”虎门的情况下就贸然撤兵。由于奕山的“胜仗”已惩治了英夷,“多余”的军队就须裁撤,这正是其避战主张的体现。

① 《始末》第二册,第712页。

② 梁章矩:《浪迹丛谈》卷五,英夷。

③ 《鸦片战争》第二册,第566页。

④ 《始末》第二册,第1085页。

事实上,在广州战事期间也曾有过停战贸易的现象。1841年3月广州处境危险,但英军贸易受损及后勤困难,义律不仅没有进攻广州,反而向参赞大臣杨芳提议停战,于是广州恢复了对外贸易。其时在道光帝宣战两个月之后。这种与宣战貌似矛盾的现象也是合乎情理的,此即道光帝的本意:以和谈替代战争。

但不久英军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又发动了更大的侵略战争,无能的奕山一败涂地,英军沿海北上,形势又趋危急了。英夷如此“桀骜不驯”,道光帝不得不再次调兵应战。他之任用奕经与任用奕山一样,只想对英军予以惩戒,故寄厚望于奕经:一定要“布置周妥,万勿性急,一鼓作气,扬我国威,歼兹丑类,宁膺懋赏,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①遗憾的是,奕经的无能并不亚于奕山,道光帝再次大失所望。至此,道光帝连消极的应战也不得不放弃。当奕经要求增兵再战时,道光帝怒其浙江之败,认为再战再败,“无非又添一层忿恨”^②。“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③因此,道光帝只想和谈赶快了结——但并非投降。

(三)

对于道光帝的“宣战”,他自己就认为“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④。现在“万不得已”之举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前线督抚将军主和的奏折这时也纷至沓来。乍浦陷后,耆英上奏:“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⑤牛鉴奏道:“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⑥

① 《鸦片战争》第四册,第274页。

② 《东华录》道光朝卷四五。

③ 《始末》第四册,第2143页。

④ 《始末》第四册,第2040页。

⑤ 《始末》第四册,第1813页。

⑥ 《始末》第四册,第2040页。